

人性的丧失与回归 ——读托妮·莫里森《心爱的人》

王 海 燕

内容提要 《心爱的人》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最优秀的小说。莫里森将笔墨集中于奴隶制下黑人人性的泯灭以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男女黑奴们被白人奴隶主当作牲畜,被剥夺了人性,导致了人格严重的自我分裂。但他们为实现自由的生存方式,勇敢地挣脱奴隶制枷锁,担负起对自我的责任,不懈地追求满溢的人生,表现出坚强的生存意志。最后,在黑人社会的帮助下,他们开始获得充盈的人生。

关键词 托妮·莫里森 《心爱的人》 黑人文学 人性 自我意识

如今,每当人们探讨美国黑人文学,总忘不了提到托妮·莫里森。莫里森是 1993 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她的第五部小说《心爱的人》获 1987 年美国普利策小说奖,并被公认为她迄今为止最好的作品。

《心爱的人》选材于 1855 年的一份剪报。一个名叫玛格丽特·加纳的黑人女奴带着她的四个孩子从肯塔基州逃到自由州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当白人奴隶主赶来追捕时,为了不让孩子们重新沦为奴隶,她准备将他们全部弄死,却只用锯条割断了年仅两岁的大女儿的喉咙。莫里森用“赛丝”这个名字代替玛格丽特·加纳。杀婴事件构成了小说的主要情节。

《心爱的人》的故事始于 1873 年,正是美国内战结束以后“南部重建时期”。小说的场景分为两部分:故事开始时的辛辛那提附近的乡村和肯塔基州一个名叫“甜蜜之家”的奴隶主庄园。

赛丝因杀死女儿而坐牢。出狱后,她回到婆婆巴比·萨格斯家——辛辛那提布鲁斯通路 124 号。从此,她被死去女儿的鬼魂及痛苦的往事折磨了 18 年之久。“甜蜜之家”唯一活下的男奴保罗·D 抵达布鲁斯通路 124 号后,赶走了鬼魂。不久,124 号来了一位自称“心爱的人”、样子似婴儿的 20 岁的女子。“心爱的人”把赛丝当作自己失散多年的母亲,不断责备赛丝抛弃了她;赛丝相信“心爱的人”是大女儿转世还魂。面对“心爱的人”对她无止境的爱的索求,她心甘情愿奉献一切,成为自己母爱的奴隶。最后,迫于生计,赛丝的小女儿邓弗尔走出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求助于黑人社会。黑人妇女们共同将“心爱的人”从 124 号驱走。她的消失标志着赛丝摆脱了过去痛苦的阴影。

莫里森将笔墨集中于奴隶制下黑人奴隶人性的泯灭以揭露种族主义的罪恶。然而,黑奴们

从未停止对充盈人生的追求。读者首先应理解奴隶制中黑人妇女的悲惨命运及她们求生存意志。她们被当作动物和生育工具,是男人泄欲的对象,没有任何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除了地里繁重的体力劳动和家务琐事,她们还不断遭受生育的痛苦。所有这一切使她们没有时间更没有精力关注自己。

正如巴巴·萨格斯从前的主人从不喊她的名字,而她也总是答应着随便他唤她什么。这否定了她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她随时可能成为男人猎取的对象,所以她总是担心被扑倒在地,尤其是当着孩子的面。难以承受的田间劳作损伤了她的臀部,以致于她走起路像一只三条腿的狗。像这样被当作动物并像动物一样行动,巴巴·萨格斯缺乏自我意识:“她丧失自我的孤独的内心充满了悲哀。悲哀的是她不知道孩子们被埋在哪里,或者,如果他们活着,已长成什么样子,事实上她了解他们甚于了解自己,她从不知自己在相片中的模样。”(172 页)^[1]

萨格斯其他七个孩子死的死,卖的卖。在“甜蜜之家”,她身边唯一的儿子哈尔注意到她行走不便,于是靠出租劳力为她赎身。她获得人身自由后,才意识到世界上没有什么比自由更美好。生命中她第一次有了自我意识:“突然她看到了她的手,眩惑之中清晰地想:‘这手属于我,这是我的手。’接着她感到胸中跳了一下,发现了另一新鲜事:她自己的心跳。它一直就在那儿吗?这嘭嘭跳的东西?她感到自己像个傻瓜,开始大笑起来。”(174 页)

萨格斯一旦有了自我意识,就决心用自己的新发现教育和启迪她的黑人同胞。她“给忠告……爱每一个人,就像这是她的工作”(168 页)。她在辛辛那提住处附近的“林中空地”宣讲“自爱”,号召黑人同胞反对奴隶主阶级灌输给他们的“自我轻蔑”。她请求他们爱身体的每一部分,尤其要爱心:“……那黑的、黑的肝脏——爱它,爱它,还有那最好的跳动的心,也爱它。现在听我的,爱你们的心,甚于爱眼睛和脚、呼吸自由空气的肺及你们孕育生命的子宫和给予生命的生殖器,因为这是我们的追求。”(108 页)她知道“自爱”是他们获得解放和自由的前提。

继萨格斯之后,赛丝来到“甜蜜之家”。由于白人奴隶主加纳夫妇具有欺骗性的仁慈,“甜蜜之家”似乎真成了赛丝的家。赛丝结婚时,憧憬有盛大的婚礼来证明她婚姻的合法与神圣,同时,宣告自己的成年身分。当她问:“有婚礼吗?”(33 页)加纳夫人认为她的问话愚蠢而无知。最后她被告知她和哈尔成为夫妇是不错的,仅此而已。赛丝曾天真地向往举行像加纳夫妇那样的婚礼,希望能被当作真正的女人对待,但她注定要失望。加纳夫人是白人奴隶主,她的婚姻受白人统治阶级保护。相反,奴隶不能合法地结合。他们被配对给主人生产小黑奴。尽管赛丝对婚礼的期盼受挫,但她偷偷地给自己缝了一件“结婚礼袍”。这一行为显示了在种族主义压制下黑人坚持自我要求的倾向。

当加纳夫人的弟弟、学校教师来管理“甜蜜之家”时,赛丝醒悟到“甜蜜之家”是一个“美妙的谎言”(271 页),她自己是世界上最笨的傻瓜。教师对他们的虐待是她以前从未体验过的。当她偶然听到教师和他两个侄子讨论她的动物特征时,她明白了自己作为动产的地位。动产奴隶完全受奴隶主支配,没有意志,没有权力,更没有优待权。赛丝认为自己特殊的天真想法破灭了,她不得不正视自己的奴隶身分。贝奈特指出:“奴隶制将人变为机器。所有蓄奴州的立法机构制定的臭名昭著的奴隶法令赋予奴隶主以极权,从而剥夺了奴隶的人性。路易安娜州奴隶法令规定:奴隶除了为奴隶主服务,不能做、不能拥有、不能得到任何东西。”^[2]赛丝进一步意识到教师将来

可能卖掉她的孩子。为了避免家人分离的痛苦,她决意跟“甜蜜之家”其他奴隶一起逃走。尽管教师对他们讲“定义属于定义者而不是被定义者”(第234页),他们还是显示出为自己定义生活的勇气。

根据逃跑“计划”,赛丝把孩子们放到篷车上。当她返回找哈尔时,在牲口棚里,她成为教师两个侄子的玩物。他们强行吮吸她因怀孕而带的乳汁。他们因她把这一罪行报告了加纳夫人而用牛皮鞭子将她的后背打得血肉模糊。赛丝没有找到哈尔,便只身逃到俄亥俄河边的荒草地。在伤痕累累、饥饿疲惫、担惊受怕的情形下,她生下第四个孩子邓弗尔。最后,在斯坦普·裴德等黑人同胞帮助下,她渡过俄亥俄河,获得新生。在布鲁斯通路124号与其他三个孩子及萨格斯重逢时,她已是体无完肤、脏乱不堪。为了获得人身自由,她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显示出坚强的意志。她以下的话表明她承担自我责任的决心:“我做成的。把我们全弄了出来。也没有哈尔帮忙。那是我自己做的唯一一件事……当然,我得到过帮助,许多帮助,但是仍然是我做成的;我做出决定,并付诸实行。现在,我自己得小心警惕。我用我自己的脑子。”(198页)

黑奴妇女除了和男人一样下地干活外,另一重要作用是生育,为奴隶主增加劳力。1641年,弗吉尼亚州首先宣判黑人为永久性奴隶,随后规定黑奴的后代也同样如此。一次偶然的机会,保罗·D明白了赛丝的身价比他的大得多,因为她是“无需花费便能再生产的财产”(281页)。教师因赛丝生育能力强而看重她。他试图将她抓回去,因为她至少还有10年的生育时间。黑奴只有在有用时,才被认为有价值。当教师看到赛丝杀婴的场面,便以为她疯了,因此,毫无价值,不值得再抓回去。赛丝的杀婴行为是奴隶制逼迫黑人人性泯灭的后果。吉那·维斯克指出:“这种种族主义社会逼迫其受害者抵抗;残杀被认为比重新沦为奴隶更具人性。”^[3]赛丝表面的残酷无情隐藏着她深深的母爱:保护她的孩子逃脱她所经历的最恶劣的人生境遇,使其不在童年遭受心灵的创伤。通过这一行为,赛丝试图在一个剥夺母权的社会声称,做为母亲,她有权对孩子做她认为对的事。

莫里森对《心爱的人》中黑人男性的刻划在她所有小说中最丰富而无与伦比。他们求生存意志同黑人女性一样强。

在白人教师的肆意虐待、残酷压制下,“甜蜜之家”的男黑奴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被当作牲畜,被剥夺了人性。教师观察记录他们的言行,以此证明黑奴需要白人的管教才能脱离野蛮的生活。这些男奴意识到只有在“甜蜜之家”,靠加纳先生赏光,他们才能是男人,否则,他们便是:“无牙的看门狗;无角的公牛;被阉割的载重马,任其嘶鸣,不会人语。”(155页)教师剥夺了他们的枪,这象征着他们男子汉气概的丧失。然而,在他们一无所有的世界里,他们奋力争取存在的意义。这表现在他们策划集体逃离奴隶制庄园,以寻求自由的存在方式。

在逃跑中,6—0被追捕者抓获,但他奋力拚搏,引吭高歌,纵声大笑。这是自我肯定的表现。在他高呼“7—0! 7—0!”(278页)时,他自信他在爱人身上留下的生命之种将获得自由。

哈尔从田里返回通知赛丝与大家一起逃跑的信号已出现时,碰到赛丝乳汁被窃取的场面。受到奴隶制思想意识的毒害,在妻子被白人奴隶主侮辱时,他不敢采取行动保护她,因为同主人作对是犯罪行为。这一精神上的被阉割,导致他最终精神崩溃。哈尔的无能和毁灭是奴隶制强加于黑奴的“自我否定”的一例。他的毁灭是他的母亲、妻儿及朋友的重大损失。他的经历亦是

那些没能逃离奴隶制因而人格分裂的黑人男女的经历,他们遭受了言语无法表达的凄惨人生。

虽然历尽非人的待遇,保罗·D 仍然在不懈地追求着身心的完整。逃跑失败,他嘴里被塞了铁条,戴着手铐脚镣被拴在马车上,准备被卖到另一种植园。这时,他见到名叫“先生”的一只公鸡。它在出生时,由于保罗·D 相救,才得以活下来。“先生”激起保罗·D 的卑微感。他从“先生”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先生”畸形的双脚是他心理残缺不全的隐喻。它的憎恨反映了他对奴隶制的痛恨。然而,他自惭不如它:“先生……看起来如此……自由。”(89 页)它比他好,更加强壮、有力:“可以在院子里随意啄食……‘先生’被允许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呆在它喜欢呆的地方。”(89 页)

保罗·D 决心杀死新主人,再一次显示出为“自我”而生活的勇气。他因此而受到惩罚,被发配到佐治亚州,戴着镣铐和其他囚犯拴在同一条铁链上做了 86 天苦力。他的非人经历达到了顶峰:“生命死了。”(134 页)他每日在坟墓般的囚房里结束一天的生活。无法吸烟的颤抖的双手象征着他男子气概的丧失。

然而,他求生存的意志并没有因此而削弱。一旦机会来临,他便努力挣脱奴隶制枷锁。骤雨急至,雨水渗进他们的囚房:“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他来不及细想。有人猛劲拉了一下铁链……他用双手使劲拉左边的链子,他旁边的人以此类推。水淹没他的双踝,流上他睡觉用的木板……沟渠坍塌,泥水从门栅下和门栅中渗进来……他们闭着眼,摸索着从门栅下的泥水中往外游。一些人迷失了方向,周围的人从拉铁链的混乱中感觉到,就把他们拽回来。因为如果一个人掉了队,所有人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啊,上帝,他们都出来了。”(135—136 页)在求生中,这群拴在一起的囚犯发挥了团结一致的力量。他们逃出来后经雨水洗礼,获得新生。“在此关头,保罗·D 同孤注一掷的同伴一起,表现出重新生活的勇气和决心,表明……担负自我责任的意志。”^[4]

随后,保罗·D 一路北上,继续追寻本真自我。越过千山万水,7 年后,保罗·D 来到布鲁斯通路 124 号,找到他一直爱恋的赛丝。在他爱的感召下,赛丝逐渐从过去的恶梦中清醒过来。两人建立了保罗·D 向往已久的家庭,共同为实现满溢的人生而努力。最后,在斯坦普·裴德帮助下,保罗·D 获得新的自我认识,从而能帮助赛丝恢复自我意识。

剥夺人性的奴隶制导致黑人们人格严重的自我分裂,以致他们人格丧失独立性而极力追求与他人认同。然而,他们摆脱奴隶制枷锁后,在社会的帮助下,开始获得自我实现的人生。

“心爱的人”的出现,带来了奴隶制所有惨痛的经验。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她是“‘被压抑者之重现’,‘死者’痛苦地重返生活”^[5]。她对爱的贪求是坚持自我要求的行为。她插足活人世界,要求世人倾听自己的心声,被理解,最主要的,被爱。她的这一要求也代表了千百万被折磨惨死的广大黑奴的心声。

“心爱的人”也体现着奴隶制造成的另一恶果:“人格深重的自我分裂及自我与他者的隔离。她对赛丝的依赖正基于这种人格的脆弱。”^[6]“心爱的人”如同赛丝前俄狄浦斯情结的婴孩,不能独立:“‘心爱的人’无法将目光从赛丝身上移开……它们舔舐、吞食着赛丝。她像一个幽灵,总是在赛丝的房间逗留不肯离开。早晨她不等天亮就爬起来,到厨房去等着看赛丝做快餐面包直到她离开……下午两点钟,赛丝下班回来时,‘心爱的人’已经在窗口或门口等着了……渐渐地,习惯使然,她开始沿着布鲁斯通路一步步走远,去迎接赛丝,陪她一起回到 124 号。似乎每天下午

她都不止一次地疑虑那年长的女人是否回转”(71页)。

“心爱的人”在人格还没有确立时被杀，她的自我被迫分解，她永不可能实现独立的自我意识。她对母亲采花的回忆体现了她自我个性意识的不稳定性。不确定的个体特性使她焦虑不安，急切地想与赛丝认同，以寻求完整的自我：“我看到了属于我的她的脸……我得得到我的脸……我的脸来了 我得得到它 我要钻进那张脸 我的黑色的脸离我很近 我很爱它 我想钻进去”(263页)。她把赛丝的脸当成自己的，而没有意识到对方的独立性，从而在各方面模仿她：“像她一样地谈笑，一样地举手投足，连叹息声都相同……邓弗尔很难辨认谁是谁。”(295—296页)

在赛丝还未形成独立的个性时，奴隶制便割断了她与母亲的联系。根据南希·乔德友的理论，母亲的照看决定婴儿自我的成长及其基本的自我情感形象。搂抱、喂养及母婴间相互连贯的影响使婴儿自身开始形成自我及个性。赛丝出生后，只吃了两三周的母乳，母亲便被迫返回地里干活，而她则和其他婴儿一起由另一女人养大。她过早地失去了母亲的看护和关爱。克里斯托弗·班德考克认为：“由于人类的童年比较长而婴儿时期的发展相应较慢，所以依赖于父母——尤其是母亲——对孩子的生存既强烈又关键。”^[7]断裂的母女联系导致赛丝心理上残缺不全。她无法意识到她的自主性。她将孩子们认成她最美好的部分。为了不让白人践踏她最好的部分，她杀了自己的女儿。这是在残暴的奴隶制下，黑人的心灵被严重扭曲的结果。

对赛丝而言，“心爱的人”不仅是她孩子的回归，也是她自己作为一个孩子的重现。当她肯定“心爱的人”是她女儿时，她说：“我要好好照顾她，没有别的母亲会像我这样照看自己的孩子、女儿。除了我自己的孩子，没有人会得到我的乳汁。”(246页)在此，通过“心爱的人”，她重新回到了自己的童年，那时她得不到足够的母乳。罗林认为：“母亲极可能将女儿作为自我的延伸体。”^[8]由于缺少母爱，赛丝努力将这一损失在女儿身上得到补偿。因此，她尽一个母亲所能奉献自己。

在赛丝对“心爱的人”无止境的奉献中，她没能担负起不容置疑的母亲的作用。为了实现孩子的社会性，这位母亲应否认其不合理的要求，而赛丝则将作母亲的权威让位于“心爱的人”：“她蜷缩在椅子上，像受到责罚的孩子舔着嘴唇，而‘心爱的人’则吞食、攫取她的生命，并一天天膨胀、高大起来。这年长的女人毫无怨言地妥协着。”(307页)在她奉献母爱时，产生了“自我”与“作母亲”的冲突。在她解释到“‘心爱的人’更重要，比她自己的生命意味更深”(296页)时，她为了“他者”而放弃了“自我”。当最后，保罗·D告诉她“你自己才是你最美好的部分”(335页)时，她的问话：“我？我？”(335页)表明在他的帮助下，她开始恢复自我意识，并“到了她重新要求生活和爱的权力的时候”^[9]。

邓弗尔渴望认同自己，表现在她对有关爱弥的故事很感兴趣。爱弥曾帮助赛丝接生，生下邓弗尔。当年，赛丝抱着襁褓中的邓弗尔一起坐牢，但她后来有意对她隐瞒了这一经历。当她的同学纳尔逊·洛德问她：“你母亲杀人被关起过吧？她进监狱时，你不是也一起去的吗？”(128页)她变聋了而不愿听到真情。至此，她便选择了自我封闭、与外界隔绝的失落的童年。“心爱的人”到来后，在孤独闭塞之中，邓弗尔立即认出她是自己的姐姐。她对“心爱的人”最初的反映是扮演母亲的角色，妒忌任何人分散她对自己的注意力。她与同自己一样孤寂的“心爱的人”认同。拥有

“心爱的人”她便能重获未实现的那部分自我。“心爱的人”成为邓弗尔情感饥饿的对象。她把对赛丝的依赖转向“心爱的人”。此时,她的自我依赖于“心爱的人”,正如一天“心爱的人”在棚屋里消失时,她所显露的:“现在她放声痛苦,因为她没有了自我……她感到自己变成薄薄的一片,最终融化得无影无踪。”(151 页)

邓弗尔重新寻求与外界联系的过程是她获得自我实现的征程。她干活养活自己和赛丝而变得自立。她告诉保罗·D 她有自己主张,这表明她依靠自己确定生活的方向。保罗·D 对她说“你已经长大了”(327 页),承认了她的成熟。现在,她已能认识母亲的自主性,正如她所说:“我想我已经失去了母亲。”(327 页)书的结尾,邓弗尔与异性所建立的健康、充满希望的关系,证明她获得了身心的平和与宁静。

《心爱的人》在希望中结尾。莫里森这样写的目的在于追溯历史,挖掘美国奴隶制对现实的影响,将希望寄托于黑人新一代。邓弗尔是新一代的缩影,她必须面对奴隶制所造成的惨痛后果,记住历史,面向未来,勇敢担负起黑人彻底解放的历史使命。

注释

[1] Toni Morrison, *Beloved* (Signet: The Penguin Group, 1987), p. 172. 本文对此小说的所有引语均出自此版本,页码随文注出。

[2] Lerone Bennett, Jr., *The Shaping of Black America* (Chicago: Johnso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5), p. 147.

[3] Gina Wisker, “‘Disremembered and Unaccounted For’: Reading Toni Morrison’s *Beloved* and Alice Walker’s *The Temple of My Familiar*,” in *Black Women’s Writing*, ed. by Gina Wisk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3), p. 93.

[4] Wilfred D. Samuels and Clenora Hudson - Weems, “‘Ripping the Veil’: Meaning through Rememory in *Beloved*,” in *Toni Morrison*, ed. by Warren French (Boston: G. K. Halle and Co., 1990), p. 126.

[5][6] Rebecca Ferguson, “History, Memory and Language in Toni Morrison’s *Beloved*,” in *Feminist Criticism: Theory and Practice*, ed. by Susan Sellers (New York: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pp. 113, 114.

[7] Chrestopher Badcock, *Essential Freud* (Basil Blackwell, 1988), p. 85.

[8] Tamsin E. Lorraine, *Gender, Identity, and the Production of Meaning* (Oxford: Vestview Press, 1990), p. 87.

[9] Karen Carmean, *Toni Morrison’s World of Fiction* (New York: The Whit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93), p. 92.